

# 试论北村的苦难意识及其书写

## ——兼与托尔斯泰比较

杨 楦

(茂名学院 文学院中文系,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 要:**北村的苦难意识形成于意义匮乏的当代社会现状和他忱于哲思的个性,表现的是个体生命的精神苦难,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北村小说强调的是形而上的苦难形式和虚幻的精神救赎,具有某种主题先行的说教和传道色彩。托尔斯泰的苦难意识形成于俄国19世纪的黑暗现实和他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受苦的主体是广大的下层人民,它的核心是人道精神;托氏小说展现的则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及不同的精神类型。

**关键词:**北村;托尔斯泰;《复活》;苦难意识;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445(2009)03-0030-04

北村,是以先锋小说家的姿态步入文坛的,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代表之一。1992年,北村由于与基督教文化的密切关系而发生创作转型,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如《施洗的河》、《水土不服》、《老木的琴》、《周渔的喊叫》、《愤怒》和《发烧》、《公路上的灵魂》等,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以宗教写作成为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的基督徒作家。此后,北村从先锋小说转向了宗教小说的创作,从热衷文本游戏、形式实验转向了对人类生存苦难的关注,生存的苦难意识、精神的痛苦裂变就凸现为小说的核心内容。

### 一、北村的苦难意识

创作转型后的北村说:“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sup>[1]</sup>那么北村时代的“苦难”是什么呢?他曾和朱必圣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60年代出生)特殊的生命态度。我们这代人要承受时代变迁之苦。前代人(60年代以前出生)的生存冲突主要表现在人生的境遇中,他们的疾苦就是所谓的遭遇之苦;而我们这代人既没有阶级斗争之苦,没有受饥饿之苦,没有劳作之苦……;但我们却承受了存在之苦。前代人的痛苦是可以通过改变生存境遇而解除;而我们这代人的痛苦是没有办法可以改变的,他的痛苦是存在

本质的痛苦。前代人想改变命运,而我们这代人却是充满了对生命的厌倦。”<sup>[2]</sup>因此,处于物质并不匮乏而匮乏的是精神的年代,北村的苦难,“更多的注意当下的生存境遇中的人性的困难”<sup>[1]</sup>,而不重在外在具体而现实的生存困境,或者由于民族历史渊源、国家体制所造成的苦难深渊。由于人性的残缺和堕落造成人性的罪恶,人性的罪恶造成人的苦难:强烈的自纵与清醒的自省纠缠交织导致精神的堕落和内心的分裂,多指孤独、痛苦、恐惧、绝望等心理体验和精神困境。北村的苦难叙事更多地向生命个体的苦难回归,书写的是个体生命,尤其是具有知识分子身份或气质的人“在路上”的精神苦难历程。人从此岸的苦难走向彼岸的幸福,靠的是信仰的救赎,正如北村所说:“我的主人公被‘逼’向信仰是一种必然结果。”<sup>[1]</sup>所以作家所设置的叙述模式是:罪恶——苦难——救赎,情节的发展终究是人物被“逼”向苦难的绝境,小说的结局只有两类:信与不信;堕落、自杀或皈依、获救。因而,有人认为北村小说虽有“苦难”主题却缺乏真正的苦难意识。

### 二、北村的苦难及书写

首先,北村小说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主要不是因为外在的物质匮乏、经济落后、社会不公、体

制弊端等,而是由于人的内在精神的问题造成的。北村喜欢用爱情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因为写爱情可以直达人类的人性深处。北村的系列爱情小说全是爱情的内在悲剧,即人性的悲剧,他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是:爱情的悲剧非来自外力的干预,而是源于人本质上不能解脱的罪恶和苦难和对自我的无能为力。在《鸟》、《长征》、《玛卓的爱情》、《周渔的火车》、《强暴》等系列爱情题材的小说中,北村首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个的爱情神话,男女主人公都是一群视爱情为氧气的情种、情痴、情圣。他们的爱情之船没有遇到什么风浪礁石,一帆风顺地开进了幸福的婚姻港湾,然而风平浪静之下,潜伏着的是主人公们内心深处的阴风暗雨,慢慢瓦解着他们的爱情信念,直至崩溃。其中的玛卓、超尘、周渔,她们都是具有神经质人格的自恋狂,她们敏感、忧郁、多疑、脆弱,她们自恋自怜孤芳自赏,她们把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把本该用于应对现实生存问题的心思全部花在对爱情的完美苛求上,因而最后表现为对生活的绝望和爱情上的告败。《周渔的火车》中陈清和周渔的爱情从炽热到背叛完全是内在的原因:人性本身的脆弱。《强暴》中刘敦煌和美娴的爱情的崩溃看似起因于美娴被人强暴这件事,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人性的自私与虚妄,人无法与人建立信任,也无法超越事实性的侵害。《鸟》中的康生和张敏是大学同学,他们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式的自由恋爱。诗人康生所坚持的美与爱和世俗的势利格格不入。当妻子愧疚地告诉他自已与苏林的雷池之越,无疑是给了他精神崩溃的导火线,但并没有使他丧失活的信心,给他带来了身心俱焚的灭顶之灾的则是因为自己也陷入与妻子同样的罪(犯奸淫)中。这种不是为义而是为罪的痛苦,像永远的污秽印在了他的生命中。这些爱情的内在悲剧直接瓦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自足的神话,使人不得不正视人性深处的深渊--黑暗和罪恶。

超尘、玛卓、刘仁、周渔、孔成、康生等人都是一些具有精神洁癖的人,他们总是认为与生俱来的东西才是最本真最纯洁的,这种对本然人性的确信就是典型的自居为义,其直接结果就是妄自尊大,自我中心,是人类的罪。他们轻易地把外界一切判为世俗而没有价值的,似乎只有他们才坚持着真理。他们的人生在护持与抗拒中自我封

闭、向内坍塌。最后的结果就是复归婴儿式的赤子心理;人生被视为丧失的过程,他们不愿长大,最终只能是人性的彻底沦落。基督教思想家帕斯卡尔认为唯一的罪人就是自以为义的人,而唯一的义人就是自以为罪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对,才是导致错的根本原因。这个世界的悲剧大多数不是恶人带来的,而是自以为高尚和正义的人带来的。这个世界的黑暗不全是为了恶而作恶所致,而是推善致恶所致<sup>[3]</sup>。

其次,北村笔下的“罪”不仅是一种外在的“罪行”,更是一种内在的“罪性”,其实质就是一种“原罪”。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个性质的罪,先有性质的罪再有行为的罪,是罪人犯罪,不是犯罪后成为罪人。《孙权的故事》中的孙权在一次醉酒之后将朋友意外杀死而入监狱。一般地说,孙权是因杀人才成为罪犯的,但在这里,北村指出,孙权不是因杀人才成为罪犯,而是内里的罪支配他去杀人。行为只是罪的结果,罪的原因则在内部。《施洗的河》的主人公刘浪,除了贩卖烟土、杀人越货、奸淫妇女等种种罪孽之外,他还由于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惧,精神上的空虚,性格的冷酷,时常做出一些出人意外、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异之事。他会一时兴起射杀无辜的女人,会在转念之间击毙心爱的猎犬,会让弟弟死于自己手下人的枪口之下,会逼迫喽罗卧在铁轨上饱受惊吓,甚至把侍奉自己几十年的老花匠逐出家门,并将花园践踏殆尽……恶念的随时爆发,好像没有任何思量的余地,甚至他本人也猝不及防。我们根本无法通过外在的环境因素和行为动因来分析刘浪的怪异性格与乖戾行为,就像龙帮帮主马大所说的,刘家人的一个共同特点:疯狂。这种疯狂不是植根于聚敛财富或者攫取权力的欲望之中,这种疯狂似乎植根于性格纵深的幽暗之处,蛰伏于血管与神经里面。实际上,《施洗的河》已经证明,人的内心潜藏着一个罪恶的渊藪,它源于人的本性而无因可循。这是一种无可逃避的罪恶——原罪。作品中传道人的一番话更加突出了基督宗教文化的“原罪”思想:“你有一个罪,它缠累你使你不得释放,叫你的心思背叛,叫你的身体犯罪,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你作恶不算什么,世人都犯了罪,是罪性不是罪行,只要有会,人都要犯罪。”<sup>[4]</sup>

北村小说从各个层面指出人性深处的黑暗

与罪恶确实存在,尤其人性深处无法挥去的罪性:人的自居为义,人性在终极上并不是和谐完善而是充满矛盾的。展现的内在人性又是黑暗而有罪的,因而人的生存必然是荒诞和无意义的,人的精神处境就如面临深渊般的恐惧和绝望,北村质疑人性的完善和谐,揭示人内在的精神困境,表现人的苦难困境,继而出示一条终极的信仰之路。

### 三、托尔斯泰的苦难意识及书写

苦难是人类根本生存处境,反抗苦难对人的压迫就成为人类的宿命。各种宗教似乎都把苦难看作是世界的本质,作家选择苦难作为信仰叙事的主题因素就成了必然。然而,在中国当代的无神语境下,北村的苦难意识及其“苦难—救赎”的书写,与西方宗教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作家相比,会呈现出怎样的独特风貌?我们且以世界文学巨匠托尔斯泰为观照。

众所周知,面对社会的急剧变革,目睹触目惊心的社会苦难,托尔斯泰在彻底否定沙皇制度、同本阶级的上流社会决裂的同时,精神上又极端苦闷,找不到答案和出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他不得不从他长期矛盾的宗教观中寻找慰藉,幻想用建立在宗教道德上的“托尔斯泰主义”来消除社会矛盾和罪恶。这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悲剧,也是19世纪俄国的时代悲剧,但正是作家的这种悲剧精神和苦难意识,使他的作品长久散发着动人的思想魅力而熠熠生辉!我们以《复活》为例,借一斑窥全豹,了解托氏的苦难意识及书写艺术。

1. 作家把人物的生活经历与精神信仰结合起来,将社会的主题和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忏悔贵族”的典型。贵族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使他由原本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大学生变成了“堕落的、定型的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姑妈家的年轻使女玛丝洛娃后将她抛弃,造成她一生的悲剧。10年后,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因被诬告犯了杀人罪而被投入监狱。法庭上的邂逅使他震惊,开始认识自己“犯了罪”,决心赎罪,为她上诉,他四处奔走。他多次探监,了解到大量冤案;奔走于上层司法、官僚机构,他看到了沙俄官僚的昏庸、凶残、嗜杀

如命及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在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他目睹了犯人们所遭受的欺凌和虐待;在乡下,跟农民的接触,他看到了贫困的农村和生命因贫困而不断消亡的卑贱和苦难……这一切,加深了聂赫留朵夫对社会的认识,进一步看到了本阶级的罪行,因此他真诚忏悔,用行动见证了他灵魂的“新生”,精神的“复活”。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原本是个天真纯洁、对生活有着美好憧憬的姑娘,被诱奸遭遗弃后,她历尽人间沧桑,生活的遭遇使她陷入苦难的深渊而感到绝望,“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以致自暴自弃,精神麻木。十年后与聂赫留朵夫的重逢,被他的真诚与行动所感动,生活的又一转折,使她又经历了灵魂复苏、灵魂转变和灵魂新生的精神历程。

2. 全景式的史诗性叙事艺术。托尔斯泰目睹亿万人民的苦难,觉得光写两个人的命运是不够的,他要真实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命运,因而以平民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的生活遭遇为主线,通过这条主线来广泛描写人民的苦难,将外在的生活流与人物的心理现象流结合起来,再现生活的广阔性和丰富性,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深刻性和真实性,展现一幅19世纪末期俄国人民水深火热的受难图。人民的不幸和苦难使悲天悯人的托翁老人沉痛若狂,他用锐利的笔锋进行无情的揭发,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造成玛丝洛娃和全体人民的苦难的罪魁祸首——沙皇专制制度的暴力机关和官方教会!

3. 多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作家运用对比手法来描绘环境、人物,增强批判的力度。如春天明媚和谐祥和的自然万物和嘈杂混乱、臭气熏天、令人沮丧郁闷的省城监狱;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玛丝洛娃在肮脏的监狱受尽折磨,聂赫留朵夫则躺在豪华住宅的高级弹簧床上吸着纸烟、悠闲自得等,无不形成鲜明的对比。托尔斯泰既通过宏观的全景式的对比来揭示主题,又通过微观的小场景的对比来展开故事,刻画人物,比如玛丝洛娃被诱奸后的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朵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而玛丝洛娃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这种对比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此外,作家还运用了独特的讽刺艺术进行批判。

4. 托尔斯泰在情节安排上一向重视情理,从不生造偶然巧合或误会冲突,人物心理刻画方面又注意曲折细腻,引人入胜,充分运用“心灵辩证法”来展示人物心灵的辩证发展过程。如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参加法院审判,认出玛丝洛娃之后的回忆、沉思、悔过反省的心理描写上。作家重点描写聂赫留朵夫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分析、评判,深入地揭示出他人性复活和道德完善的渐进过程。有时,人物心理活动的发展,是通过外界事物,尤其是人民广泛的苦难生存状况促使这位年轻贵族走向忏悔之路,获得彻底的“新生”和灵魂的“复活”。

#### 四、结语

综上所述,托尔斯泰笔下的苦难是源自于沙皇的暴力统治,受苦的主体是广大的下层人民,人民的苦难使这位来自显赫贵族家族的作家走向长期的精神探索之路。他的苦难意识形成于俄国19世纪的黑暗现实和他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它的核心是人道精神。而中国当代的北村,他笔下的苦难主要源自于人性的残缺和罪恶而导致的生存意义的缺失,他书写的是个体生命“在路上”的精神苦难历程,而不是群体的民族的或历史渊源、文化积淀的苦难深渊。受苦的主体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取向的生命个体。身为基督徒作家的北村,他同时又是胸怀人文情怀的当代哲人,他曾说:“作为一个作家,对人自身最坚决、深刻、彻底的批判

和否定,只能来自于信仰。对我而言,人文精神就是我的信仰。”他的苦难意识形成于意义匮乏的当代社会现状和他忱于哲思的个性,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sup>[5]</sup>。

在书写苦难方面,北村和托尔斯泰都运用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他们的小说都讲述他们的精神斗争以及几乎不顾一切去寻找上帝以及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故事;他们在创作时都喜欢引“经”据典,多引用《圣经》的一些章句,深化作品的宗教主题。不同的是,由于北村小说只强调形而上的苦难形式和虚幻的精神救赎,以及小说单一的情节模式和人物类型,使我们感觉到某种主题先行的说教和传道色彩;托尔斯泰则是非常娴熟地运用多种手法书写苦难及刻画人物心理,使我们看到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及不同的精神类型,人物的心理历程非常真实而丰富地展现于读者面前,我们从中感到的只是作家精神关怀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本身。

#### 参考文献:

- [1] 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J].花城,1996(6):145-150.
- [2] 朱必圣.由怀疑到信仰——北村的重担和他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5(4):58-62.
- [3] 齐宏伟.以终极关怀的热情透视世界的苦难和苦难的世界——从《长征》看北村的心灵写作[J].社会科学论坛,2004:49-55.
- [4] 北村.施洗的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224.
- [5] 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J].钟山,1995(4):181-182.

##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and Writing Style of Beicun

——Compared with that of Tolstoy

YANG Bing

(College of Law and Chinese Literature, Maoming University, Guangdong Maoming 525000, China)

**Abstract:**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of Beicun comes from state quo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his own personality of sentiment thinking on philosophy and wisdom. This consciousness reflects mental suffering of human being and regards humanity as its core. What is emphasized in Beicun's novel is super organic suffering situation and spiritual redeeming, which has the nature of lecturing and preaching with some topic in advance.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of Tolstoy comes from gloomy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of Russia and his humanism of compassion on the world and its people, where it is vast roughscuff that suffers most and core of which is humanism. What's reflected in Tolstoy's works is wide social life and different spiritual types.

**Key words:** Beicun; Tolstoy; Resurrection;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writing style

(责任编辑:孟建安)